

街角社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美〕威廉·富特·怀特 著

商务印书馆

街 角 社 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美] 威廉·富特·怀特 著

黄育馥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William Foote Whyte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Fourth Edition 199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1943, 1955, 1981, 199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经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许可根据1993年第四版译出

JIEJIAO SHEHUI

街角社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美〕威廉·富特·怀特 著

黄育馥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39-4 / C·4

199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38千
印数 1 690册	印张 14 1/8

定价: 12.60元

出版说明

威廉·富特·怀特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191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1943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自1942年起，曾先后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1964年任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主席，1977至1978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并兼任多项职务。1982年曾来华讲学。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主要著作还有《拉丁美洲美国企业中人的问题》(Human Problems of U. S. Enterprise in Latin America, 1956)、《组织行为：理论与应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ory and Application, 1969)等书。

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陶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本书即是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第一版于1943年出版。1955年作者在第二版出版时增写了附录一，描述他在科纳维尔生活和工作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

和个人的经历。1981年出版的第三版又增加了“重访科纳维尔”一节，跟踪描述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截止到1980年以前的经历，并简单提及这一地区本身的变化。此外还增加了作者最重要的研究助手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一篇讲演稿，即“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一文。奥兰代拉雄辩地说明，在怀特及《街角社会》一书的影响下，他如何从一个在科纳维尔街角闲荡的意大利青年转变为一名出色的城市公共工程部门负责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后来的军队和平民生活中成功地运用了怀特教给他的研究方法。

1991年，本书在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突然又成为学术界关心的一个新的焦点，一些学者撰文评论《街角社会》，对作者使用的参与观察法提出质疑。有人甚至指责作者在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方面违背了职业道德。作者认为他无须为他的品德或这本书的声誉辩护，因为这些学者都承认《街角社会》是“一部社会学的经典”，然而他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涉及在过去50年内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的变化。这促使作者在略加修改后于1993年出版了本书的第四版。在增写的“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一节中，他回答了评论者的质疑，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后基础批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正如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街角社会》是早期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实地研究的一部完整的记录，是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它开辟了在城市中进行实地研究的新领域，并确立了研究标准。因此早在40多年前就被列为社会学经典著作，至今在美国大学里仍被作为社会学必读书，并被那些从事城市实地研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视为一本研究方法方面的标准参考书。

怀特先生对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表示欣喜和支持。他主动向

译者寄赠刚刚出版的第四版图书，并应邀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此，我们谨向怀特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3年11月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第四版序言	3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6
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	13
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14
一 诺顿帮的成员	14
二 保龄球和社会地位	28
三 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	41
四 多克的政治竞选	53
五 解体	60
第二章 奇克和他的俱乐部	72
一 奇克·莫雷利的故事	72
二 组织俱乐部	78
三 社交活动	82
四 反对奇克	89
五 第二个季度	94
六 分裂	103
七 共和党政治	113
八 奇克·莫雷利的事业	116
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122
一 群体的性质	122
二 街坊文教馆的社会角色	126

三 忠诚和社会流动.....	132
第二编 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	139
第四章 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	140
一 非法团伙活动的历史.....	140
二 彩票赌博组织.....	145
三 与警方的关系.....	153
四 社会背景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172
第五章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180
一 托尼·卡塔尔多和谢尔比大街的青年们.....	180
二 组织俱乐部.....	183
三 改组俱乐部.....	187
四 政治争端.....	193
五 危机和托尼·卡塔尔多.....	205
六 托尼的宾戈赌会.....	217
七 新的管理机构.....	220
八 卡洛和托尼.....	227
第六章 政治和社会结构.....	232
一 政治组织性质的不断变化.....	232
二 政治生涯.....	245
三 组织竞选.....	254
四 政治集会.....	264
五 选举日.....	276
六 政治义务的性质.....	281
第三编 结论.....	293
结论.....	294
一 帮与个人.....	294
二 社会结构.....	308

三 科纳维尔的问题.....	312
附录	317
附录一 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	318
一 个人背景.....	319
二 选中科纳维尔.....	322
三 制定研究计划.....	323
四 最初的努力.....	327
五 与多克交往的开端.....	336
六 参与观察的训练.....	338
七 政治冒险.....	347
八 重返诺顿街.....	356
九 重新制定研究计划.....	359
十 还是街角帮.....	363
十一 研究非法团伙活动.....	367
十二 向市政厅进军.....	375
十三 告别科纳维尔.....	379
十四 重访科纳维尔.....	380
十五 使《街角社会》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被接受.....	392
十六 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	395
附录二 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	413
附录三 参考文献举要	430
索引	433
图表目录	
诺顿帮, 1937年春季和夏季.....	27
安杰洛的小伙子们.....	68
街角交谈.....	123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 1939年9月初.....	189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 1940年2月.....	222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 1940年夏.....	226
拉韦洛的竞选组织.....	262
拘捕和开脱.....	290
建成公园的围栏.....	292

中文版序言

我最初接触中国社会学是在 1942 年秋,当时我刚开始在俄克拉何马大学任教。有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组织了一门关于“太平洋地区民族”的课程。这门课需要有两个讲座,分别讲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原来讲这两讲的教授均在战争中去军中服役,于是这门课的组织者问我能否接替这项工作。我对他说,我对中国或日本从无研究,但他恳求我即席讲点儿什么。

我曾读过约翰·恩布里介绍一个日本乡村的《须惠村》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鉴于我认为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均无力作出全面的论述,我决定把力量集中放在农村生活方面,而那两篇杰出的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

通过我的儿子马丁·金·怀特,我也间接地与中国有了联系。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方面,马丁已成为居领先地位的学者之一。他曾在密西根大学参加过对底特律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调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与其中中国同行们一道,对几个中国城市里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他还和他在密西根大学的其他同事,与四川大学师生一起对成都进行调查(1987),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对北京和保定进行调查(1991)。

这些项目有着几个彼此相关的目的:增进对于我们两国内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了解,有助于在参加调查的大学之间发展有关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知识。

费博士访问加拿大时,我和马丁·怀特曾在多伦多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了他。在他访问美国的大学时,他说明宁愿住在教授

家里,而不愿住宾馆。在密西根大学,他与马丁一家住在一起。在科奈尔,凯瑟琳和我则很高兴地请他住在我家。与他的交谈重又激起了我们对中国的兴趣。

1982年春,凯瑟琳和我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访问了中国。我在北京、西安和上海作了关于美国社会学的演讲,并与大学里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师生进行了讨论。我们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假如我没有退休,我一定会被吸引着去开始一个新的研究生涯,即中国研究。

1993年出版的《街角社会》50周年版中文译本的问世,将成为我对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直至不久前,社会学界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我曾使用的参与观察法与其他定性方法一样,已经过时,正在被调查研究和分析统计排挤到一旁。人们认为定量社会学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这种趋势在美国社会学中似乎已经改变。社会学家们并不是要摒弃调查研究,而是逐渐认识到,仅凭调查,你的理解无法达到你通过已发展得十分纯熟的定性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最近,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向定性社会学研究提供资助。看来,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社会学的前途将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

威廉·富特·怀特

1993年8月

第四版序言

xi

我为本项研究进行的实地工作是靠哈佛大学的一项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1936—1940年)。从1937年2月到1938年5月,我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这家人在帕门特大街7号开着一家餐馆。我与凯瑟琳·金结婚以后,我们搬到同一地区内的汉诺威大街477号我们自己的公寓里,这个地区就是波士顿北区,我称它为科纳维尔。在1940年7月我离开波士顿之前,我已经写完了《街角社会》的初稿。1940年到194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又重写并压缩了在波士顿写的初稿,但对我的分析和理论方向未作任何改动。《街角社会》的第一版于1943年出版。

如果没有研究员学会赋予我的支持和完全自由,我绝不能进行对科纳维尔的这项研究。我个人深深地感激社会人类学家康拉德·M. 阿伦斯伯格,他作为一名青年研究员的时期与我的这一时期有所重叠。我在开始我这项研究之前就曾与他讨论过我的计划,在研究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也都得益于他的忠告和批评。埃利奥特·D. 查普尔和阿伦斯伯格曾共同拟定了研究相互作用的概念框架,而这也正是我在全书中使用的框架。

关于我最初的研究计划,我曾从研究员协会主席劳伦斯·J. 亨德森那里获得了使我很伤脑筋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忠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则指导我学习了我在研究中使用的访谈技术。

约翰·霍华德和我一样,是一名青年研究员,他曾在科纳维尔

从事过为期两年的实地研究。是他首先提出，对领导层的分析将提供一种使整个研究成为一体的方法。

xii 凯瑟琳·金·怀特与我一起度过了我在科纳维尔的最后两年。她绘制了图表，并在撰写这部书稿的各个准备阶段对它提出批评意见。她以前曾为纽约的出版商们设计过书的护封，因此，她志愿为本书的第一版设计了护封。

在芝加哥大学，我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曾得到社会人类学家 W. 劳埃德·沃纳和社会学家埃弗雷特·C. 休斯有益的建议。除《街角社会》外，他们还帮助使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的经历成为一种令人振奋的学习过程。

为了这本书的第二版(1955年)，我写了附录一，描述了我在这北区生活和工作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个人的经历。

为了这本书的第三版(1981年)，我增写了“重访科纳维尔”一节，跟踪描述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截止到1980年以前的经历，并简单提到了这一地区本身的变化。在第三版中，我首次说明了研究地点是波士顿北区，并道出了几个主要人物的真实姓名。

附录二，即“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是我的最重要的研究助手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萨姆·弗朗哥)在一次标志着我退休的康奈尔大学讨论会上的致辞。在这里，奥兰代拉雄辩地说明了我们曾如何在一起工作，以及我们发展的方法曾如何有助于他在后来的军队和平民生活中担任领导工作。

所有这些资料略经修改之后，都被包括在这个50周年的新版本中。我在附录一中增加了“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一节。促使这一版问世的动力是学术界突然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1991年，彼得·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事们编了《重新构想组织文化》一书，并用很大篇幅介绍《街角社会》，其中包括重印了我的关于论述方法和经验的附录，作为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随后是4位

行为科学家有关《街角社会》的文章以及我对于这些评论的反应。1992年4月号的《当代人种志杂志》上刊登的则完全是有关“重访街角社会”的文章。在编者序言之后，这期杂志先刊登了W. A. xiii 玛丽安娜·贝伦的文章，在我于1940年离开北区之后的30至45年之间，她曾几次访问北区，并访问了我曾研究过的一些人和其他一些人。根据这些资料，她论证说，我对北区的描绘是一种歪曲，并违背了职业道德。接着是我本人对此进行的反驳以及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文章——他原来是个街角青年，曾在我这项研究中与我一起工作。这期杂志最后刊载的是由3位行为科学家撰写的关于这场争论的文章。

在这两份出版物中，这7位行为科学家都承认《街角社会》是一个里程碑。然而，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涉及在过去50年内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的变化。此外，这些争论还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或者，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努力使它成为一门科学。

我在“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即附录一的最后一部分中论述了这些问题。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在“东城”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叫作科纳维尔的贫民区，那里居住的几乎都是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对于这个城市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危险和令人忧虑的地区。从高级的商业区大街步行到科纳维尔，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商业区大街的居民走到这里来，却是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多年来，科纳维尔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区，而且，在我们与意大利交战期间，这个问题日益引起这一地区以外的人们的关注。他们生怕这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居民热爱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基于热爱民主和美国。他们早就觉得科纳维尔与社会其他地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它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贫穷和犯罪、以及起颠覆作用的信仰和活动的大本营。

体面的人们对科纳维尔的情况了解得很有限。他们也许听说这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每当为了向上层阶级人士表明下层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而组织巡回视察时，这里都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区之一。通过参观或统计数字，人们可以发现，那里难得有浴缸，狭窄失修的街道上到处是孩子，青少年犯罪率很高，成年人犯罪十分普遍，在萧条时期这里的很大一部分人是靠家庭救济金或公共事业振兴署维持生活。

由此看来，科纳维尔人好像是社会工作的对象、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或者，统统是“下层阶级”的成员。这样的描绘中有一个错误：其中没有人。那些关心科纳维尔的人谋求通过泛泛的调查来解答只有最熟悉当地的生活才能解答的问题。要达到这样的了

解,唯一的办法是到科纳维尔去生活,并参加那里的人们的活动。xvi
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发现你面前的这个地区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以前看上去圯废失修、拥挤不堪的建筑物和大街小巷向后隐退,为科纳维尔舞台上的演员们组成了一幅人们所熟悉的背景。

你在进入科纳维尔以前,也许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那里的某些非法勾当团伙成员和政治家的情况。不过,报纸上描绘的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假如一名非法团伙成员犯了谋杀罪,那是新闻。而假如他悄悄地作他的日常生意,那就不是新闻。假如某位政治家被控告受贿,那是新闻。而假如他四处奔波照常为他的选民办好事,那就不是新闻。报纸上集中注意的是危机——惊人的事件。在危机中,“大人物”变成了公共财产。人们把他与他在其中行使功能的社会分开,评价他的标准也与他自己群体的那些标准不啻。这也许是对违法者提起公诉的最佳方式,却并非了解他的好方法。要想了解他,必须将他放回到其社会环境之中,并观察他的日常活动。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的生活模式来认识它——因为科纳维尔的生活是有一种模式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把这个贫民区视为一团糟,一种社会混乱状态。而了解内情的人却在科纳维尔发现了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完整的社会制度。

所以,由此可见,对于就科纳维尔提出的问题,无法立即直接作出解答。只有在摸清了它的社会结构及它的行动模式以后,才能回答具体的问题。这就需要去研究新的领域。为了了解现有的组织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地意大利人居留地的历史。然后,我们就该走进去结识那里的人们,以便从他们身上发现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性质。

对于今天的科纳维尔来说,它的历史始于19世纪60年代。那时,一小批热那亚人共同在当时是爱尔兰人居住区内一角的一条小巷里安了家。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意大利移民还只是 xvii